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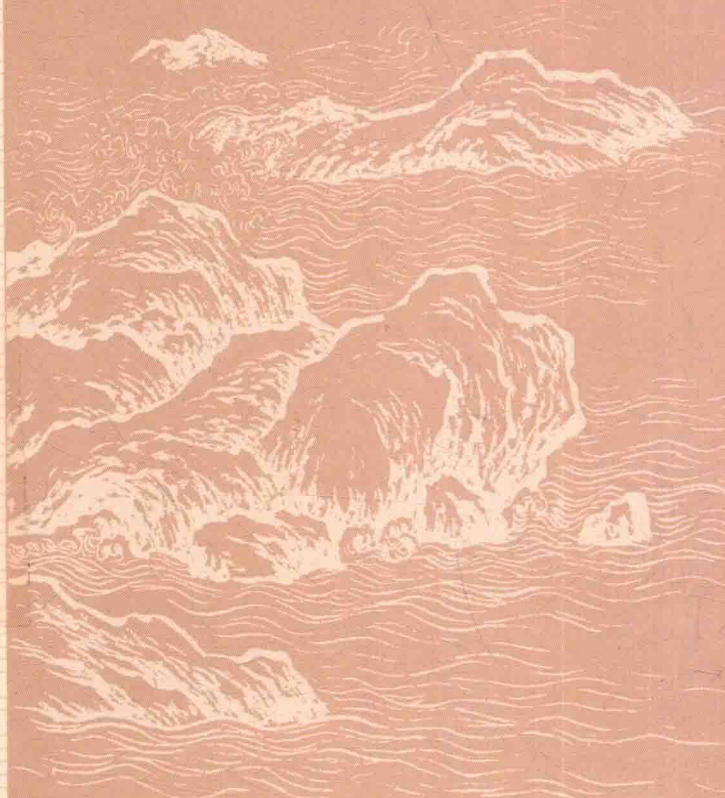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

GUDAI ZHUANJI LILUN YANJIU

俞樟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古
代
传
记
理
论
研
究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

GUDAI ZHUANJI LILUN YANJIU

俞樟华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 / 俞樟华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207-11303-0

I. ①古… II. ①俞… III. ①传记文学评论—中国—古代 IV. 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0509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封面设计:张 涛

责任校对:秋云平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

俞樟华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1303-0

定 价 7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绪论:古代传记理论鸟瞰	(1)
引言	(1)
汉代的传记理论	(8)
魏晋南北朝的传记理论	(19)
唐代的传记理论	(26)
宋代的传记理论	(41)
明代的传记理论	(53)
清代的传记理论	(61)
一、传记释名	(79)
1. 传	(79)
2. 传记	(81)
3. 列传	(83)
4. 别传	(86)
5. 杂传	(87)
6. 史传	(89)
7. 自传	(90)
8. 传记文学	(92)
二、传记的体例	(94)
1. 传体的创立	(94)
2. 传与经	(95)
3. 传与纪及表	(97)
4. 纪传与编年	(100)
4. 传目设立原则	(101)
5. 附传	(104)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

6. 合传	(106)
7. 其他	(111)
三、传记的分类	(114)
1. 传记分类的历史	(114)
2. 传记分类的意义	(117)
四、传记的作者	(125)
1. 传记作者的职责	(125)
2. 个体与群体	(131)
3. 传记作者的才德	(137)
4. 非史官不可为人立传	(150)
五、传记的写作宗旨	(154)
1. “成一家之言”	(154)
2. 扬善惩恶,经世致用	(163)
3. 补史传之缺和辩诬	(170)
4. 歌颂先人,传名后世	(173)
六、传记的立传标准	(178)
1. 为有功名者立传	(178)
2. 为死人还是活人立传	(184)
3. 非高官不得立传	(186)
4. 为时代和社会的代表立传	(190)
七、传记材料的搜集与整理	(197)
1. 传记材料的搜集	(197)
2. 传记材料的整理	(201)
八、传记的真实性	(218)
1. 传记真实的意义	(218)
2. 传记失真的原因	(223)
九、传记的人物写作	(235)
1. 优劣兼写	(237)
2. 细节描写,以小见大	(238)
3. 善写“独至”	(241)
4. 记言要“适如其人之言”	(244)

5. 选材典型,详略得当	(247)
6. 对比映照,互相衬托	(249)
7. 言人人殊,各得其解	(254)
十、传记的叙事	(260)
1. 叙事“以人为纲”	(260)
2. 叙事以简核为贵	(261)
3. 寓论断于叙事之中	(265)
4. 叙事笔法不主一格	(268)
5. 传记的布局谋篇	(273)
十一、传记的语言	(279)
1. 传记语言的简洁	(279)
2. 传记语言的繁简	(283)
3. 传记语言的师承	(294)
十二、传记名著《史记》的影响	(299)
(一)《史记》对古代诗歌的影响	(299)
(二)《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影响	(307)
(三)《史记》对古代小说的影响	(321)
(四)后代传记无法超越《史记》的原因	(342)
附录一:论文五篇	
论古代的行状理论	(352)
一、目的论	(352)
二、人物论	(355)
三、创作论	(357)
四、文体论	(360)
实录与文学——历史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交融	(363)
一	(363)
二	(366)
三	(369)
自撰墓志铭文化心理管窥	(374)
一、“患人不知”的自白书	(375)
二、“明贬实讽”的忏悔书	(376)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

三、“何以解忧”的自嘲书	(376)
苏轼散传概论	(379)
地域视野下的郁达夫自传研究	(394)
一、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自传的繁荣	(396)
二、郁达夫自传的主要特点	(399)
三、地域文化对郁达夫自传的影响	(402)
四、结语	(409)
附录二：书评五篇	
中国传记文学独特发展之路——评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411)
向着中国传记文学理论开拓——评俞樟华《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415)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的开拓之作——读《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420)
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视角——读《中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423)
俞樟华教授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426)
一、《史记》研究的集成性	(426)
二、传记研究的开拓性	(430)
三、学术史研究的创新性	(433)
参考文献	(437)
后 记	(442)

绪论：古代传记理论鸟瞰

引 言

古代传记理论批评,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加以认真研究。但是,从以往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看,自1927年陈钟凡先生所著的我国文论史上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到1996年顾易生、王运熙两位先生主编的洋洋大观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出版,都没有将中国传记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这些著作主要都是介绍和分析古代的诗论、文论、曲论、小说论的,至于传记理论则大多没有什么涉及。迄今为止,国内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有关古代传记理论批评方面的研究专著。所以说,我国古代传记理论批评的研究,基本上还属于一片空白,需要我们努力去加以开拓。

其实,我国古代并非没有传记理论。古代传记创作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和非常丰富多彩的作品,尤其是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曄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为代表的史传文学作品,更是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甚大,人们在阅读欣赏之余,往往会对它们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提出许多颇具理论色彩的观点。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于提出问题,做出结论,发表直觉式的观感,而不一定加以详细阐述,所以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再说,长期以来,对于人们陆续提出的那些有关传记的片断评论,也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和及时的记录整理。在古代,一直没有出现过一部专门性的传记理论批评著作。

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代传记理论的研究工作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工作,首先就面临着资料的搜集、鉴别、校勘、整理的任务。这项工作是非常烦琐和艰难的。尤其是古代传记的资料零碎分散,吉光片羽,遍布在性质完全不同的各种典籍之中,需要爬梳剔抉、刮垢

磨光的浩繁功夫。大致说来,古代传记理论资料,主要散见在下列著作之中:一是传记作品的序跋论赞,如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的《汉书·叙传》、令德狐棻的《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等;二是历代各种史书,如前四史、《宋书》《隋书》《新唐书》《唐会要》《五代会要》《清实录》等;三是历代文人对史传和杂传作品的评点著作,如宋代倪思和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明代茅坤的《史记钞》、杨慎的《史记题评》、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于慎行的《读史漫录》、清代汤谐的《史记半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牛运震的《史记评注》、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四是各种笔记杂著,如洪迈的《容斋随笔》、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黄震的《黄氏日钞》、顾炎武的《日知录》、李晚芳的《读史管见》、曾国藩的《求阙斋读书录》等;五是各种目录学著作,如刘歆的《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阮孝绪的《七录》、魏徵的《隋书·经籍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郑樵的《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崇文总目》、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六是各类文学批评著作,如王充的《论衡》、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李涂的《文章精义》、刘大槩的《论文偶记》、魏际瑞的《伯子论文》、吴德旋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刘熙载的《艺概》、林纾的《春觉斋论文》、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等;七是各种历史评论和小说评论著作,如刘知幾的《史通》、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国史部》、吴缙的《新唐书纠谬》、吕夏卿的《唐书直笔》、吕祖谦的《大事记解题》、高似孙的《史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的《红楼梦》、冯镇峦评点的《聊斋志异》等;八是诗文书信序跋奏议表状,如刘向的《列女传序》、荀悦的《汉纪序》、袁宏的《后汉纪序》、刘知幾的《上萧至忠论史书》和《答郑惟忠史才论》、柳冕的《答孟判官宇文生评史官书》、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柳宗元的《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和《与韩愈论史官书》、李翱的《百官行状奏》、殷侗的《请试史学奏》、李德裕的《论修史体例状》、孙樵的《与高锡望书》和《孙氏西斋录》、沈既济的《论则天不宜称本纪议》、欧阳修的《论史馆日历状》、吴缙的《新唐书纠谬序》、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和《南齐书目录序》、马存的《赠盖邦式序》、黄幹的《朱子行

状书后》、宋濂的《杂传九首并序》和《赠传神陈德颜序》、王世贞的《史乘考误序》、方孝孺的《晋论二首》、张岱的《史阙序》以及《家传》、黄宗羲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和《与李杲堂陈介眉书》、徐乾学的《修明史条议》、钱大昕的《拟国史儒林传序》、朱彝尊的《史馆上总裁书》、叶方蔼的《请购书籍疏》、施闰章的《修史议》、潘耒的《修明史议》等;九是帝王诏书和一些专题文章,如唐高祖李渊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唐太宗李世民的《修晋书诏》、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清实录》中有关修撰《明史》的许多诏书、张辅的《班马优劣论》、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欧阳修的《论尹师鲁墓志》、李贽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袁宗道的《论文》、戴名世的《史论》、龚自珍的《史尊》、汪由敦的《史裁蠹说》等;十是历代文学作品选,如萧统的《文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吴楚材和吴调侯的《古文观止》、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董诰的《全唐文》等。以上是我们撰写本书时取材的主要方面。由于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我们所涉猎到的材料还是十分有限的,还很不完整,搜集古代传记理论资料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把已经搜集到的资料加以整理分析,先贡献给读者,目的是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引起人们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和研究,从而把传记理论体系建立起来。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搜集古代传记资料时,对散见于小说戏曲中的一些材料也予以了充分地注意。早在六十年前,钱钟书先生就说过,人们在治文学批评时,只习惯于从传统的诗文评著中去找材料,这些诗文评著大多是陈陈相因的。殊不知,在小说戏曲中,往往时有益人神智的文学批评,三言两语就深中肯綮,切中要害,值得引起重视。钱先生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扩大古代传记批评资料的寻找范围,是有启发的。照此办理,我们的确可以从古代小说和戏曲著作中发现一些与传记批评有关的言论,如清代著名的戏曲家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曾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这段话的本意在于讲戏曲文学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含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所有文体,从而成为一种“无体不备”的文学艺术样式。但是作者在论述戏曲文学与各体文学的关系时,涉及了史传文学在“义”和“用笔行文”方面对戏曲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这对我们认识史传文学与其他文体的密切



古代传记理论研究

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国古代戏曲历来崇尚“以曲为史”的传统,不仅戏曲的题材与史传比较一致,而且还要求戏曲与史传一样,具有记载历史事件、评判是非善恶的政治教化功能。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杂论》中曾经说过:戏曲应“本古史传杂说略施丹垩,不欲脱空杜撰”,并进而指出:“古人往矣,吾取古事,丽今声,华袞其贤者,粉墨其愚者,奏之场上,令观者藉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为有关世教文字。”王骥德主张戏曲的题材应该来源于史传,不能凭空杜撰虚构;戏曲的功能也和史传一样,都是为了感化人、教育人。这说明史传文学对戏曲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再如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著名的文言笔记小说,曾享有同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崇高盛誉。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所记载的故事,很好地印证了曾巩所谓死者子孙为借墓志铭“褒扬其亲”“以夸后世”而失真的原因,其云: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则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前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谏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诌,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诌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胜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①

纪昀在这里借小说人物之口,批评了墓志铭在写作中曲笔徇情、无美称美、

^①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三《槐西杂志》三。

弄虚作假、微功过褒、夸大失实的严重弊病，提出了传记要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真实可信的问题。小说中的“某公”，是个读书为官都无所建树的普通人，死后数年其坟前巨大的墓碑上却写着连他自己也不敢接受的溢美之词，以致受到了时人的“讥评”，鬼物的“嘲笑”，只好远避他处，可见他还有些自知之明，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欣然接受而毫无愧色。可是墓志铭这种为了“尽其孝子慈孙之心”而专门“论列德美功烈”“称美弗称恶”^①的做法，在封建社会墓志碑传文章写作中已成为约定俗成、亘古不变的通例，所以无中生有，过分美化死者的谀墓之作不绝如缕，危害甚大。著名学者蔡邕是汉代写碑传文的高手，至今尚有数十篇碑文传世，但是他也曾不无遗憾地对卢植说道：“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②这说明他所写的碑传文，也不免夸大其词、华而不实之病。韩愈是中唐时期撰写墓志铭、碑传文最多的作家，因为后来李商隐在《纪事·齐鲁二生·刘叉》中记载了下面的故事：“（刘叉）闻韩愈善接天下士，步行归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所以韩愈就成了一个“谀墓”的典型。尽管韩愈是否“谀墓”古今评价不一，可以讨论，但是，古代的谀墓之风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有鉴于此，曹操曾在建安十年下令禁止随意立碑；到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朝廷又下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其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为毁坏。”^③口气十分严厉，不容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晋正始中，学者桓范在《世要论·铭诔篇》中，对这种华而不实、充满着陈词滥调的碑传文也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视常侍黄门，宾客假其气势，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上，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竟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桓范的批评，把碑传文夸大事实而失

①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② 《后汉书·郭泰传》。

③ 《宋书·礼志二》。

真溢美的弊病和它“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的巨大危害揭露得一针见血,十分有力。我们对照一下纪昀上面这段描写,其主旨是完全一样的。“某公”对碑文的全盘否定,对“名士”劝慰的强烈不满,其实正是作者对这类谀墓之作的否定和不满,文末“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一句,卒章显志,已经画龙点睛般地揭示了作品的主旨、作者的用意。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完全应该把它当作传记批评资料来看待,来评价。

在我国古代,传记理论的兴起,不仅远远落后于史论、文论,而且长期以来与史论和文论等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不好区别,无法独立,所以,在我国古代,专门从事传记理论研究的学者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一些传记理论资料,大多是人们在论史论文的时候涉及的,除了少部分之外,大多数理论,就作者当时来说,并不完全是针对传记创作而言的,或者说作者当时的本意并不在此;还有些文论,它在论文时,又包含了传记在内的所有文章。又因为古代史传文学本身就是古代史书中的重要部分,古人论史书和论史传的理论本来就是一回事,有时是很难区分清楚的。古代传记的亦史亦文性质,造成了古代传记理论在史论和文论中都有的现象。因此,古代传记理论的不纯,界限的不清,为我们今天的具体操作带来了许多不便。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取舍,只要是与传记有关的理论,不管是史论还是文论,我们不妨都加以援引评介,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在回顾古代传记批评发展历史时,我们发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因为既是杰出的历史著作,也是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所以无论是历史评论著作,还是文学评论著作,都对它们有许多评论。换句话说,人们在评论中,是把《史记》和《汉书》当作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评论鉴赏的。在二十四史中,也只有这两部书有这种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传记批评史上,有关《史记》和《汉书》的批评材料最多,此后数量众多的史书,因为缺少文学价值,所以就很少有人将它们与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了。这样一来,所谓古代史传文学批评,在一定意义上说,只是对《史记》和《汉书》的批评,这是古代传记批评史上的一种特有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下面的论述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较多地引述到各个阶段的评论家对这两部书的评论内容。

古代学者把《史记》和《汉书》与其他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批评的现象,是从唐代开始的,此后这方面的材料触目皆是,多的不可胜举,比如韩愈

在《答刘正夫》一文中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其弟子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也指出：“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御寇、庄周、鶡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韩愈的另一位高足皇甫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也说：“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宋代唐庚在《文录》中曾说：“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三百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他的这个主张，开了明代前七子和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口号的先声。明代学者方孝孺在《张彦辉文集序》中谈到文章的不同风格和作者的为人品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时曾指出：“庄周为人，有壶视天地，囊括万物之态，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飘飘然若云游龙骞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礼，故其文敦厚而严正，如大儒老师，衣冠伟然，揖让进退，具有法度。韩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缴绕深切，排搏纠缠，比辞联类，如法吏议狱，务尽其意，使人无所措手。司马迁豪迈不羁，宽大易直，故其文卒平如恒华，浩乎如江河，曲尽周密，如家人父子，语不尚藻饰而终不可学。司马相如有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绮曼夸都，如清歌绕梁，中节可听。贾谊少年意气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笃有谋，悲壮矫讦。扬雄齷齪自信，木讷少风节，故其文拘东恚愿，模拟窥窃，蹇涩不畅，用心虽劳，而去道远。”文章从先秦的庄子、荀子一路论述下来，除了上文引述到的以外，还有陶渊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把司马迁与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家相提并论，说明方孝孺完全是把司马迁视作一位文学家来看待的，而且论其文先论其人，这也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批评方法。清代郑燮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也说：“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这是说文章只有写得富有浓烈的感情才算上乘，才能够感动人。从唐代一直到清代的文论，人们都是把《史记》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评论的。在后代文学家和文论家眼里，《史记》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部精美绝伦的散文著作。这种情况，只有《史记》和《汉书》有，其他史学著作就没有这种福分了。《史》《汉》这种文史兼优的特点，造成了后代文章家和史学家都对它们特别重视和爱好的局面，以致留下的评论资料要远远胜过其他史书。

汉代的传记理论

我国先秦时代,是传记的萌芽时代。在《诗经》《左传》《战国策》等著作中,都有一些人物描写,尤其是先秦史传散文中的人物刻画,已经非常成功,它们对汉代司马迁开创传记文学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可是由于先秦的所有著作都不是以写人为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还不可能有传记文学的观念,也不可能出现有关传记文学方面的理论。我国古代传记理论,是在汉代才产生的。可以说,司马迁开创传记文学的同时,也是古代传记文学理论产生之时。伟大的司马迁是在有较为明确的理论指导下从事传记创作的。他认为,史传文学的创作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通过人物传记来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总结历史的发展规律,然后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写出一部自成一家的著作。这个创作目的,表现了司马迁的求实与创新精神。在史传文学的立传标准上,司马迁明确主张为那些在历史上建立了功名的历史人物立传,他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之人称焉”;又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所写的人物尽管形形色色,方方面面都有,但就总体而言,都是一些叱咤风云、名震千古的有功之人。司马迁的这个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解决了史传文学作品为谁立传的问题,为以后的史传文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树立了创作样板。为有功名的历史人物立传,以后成了传记文学的重要写作原则而被人们遵循坚持。在史传文学的材料搜集和整理上,司马迁认为,有关历史人物的材料应该搜集得越多越好,不仅要尽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还要“细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甚至进行实地调查访问,把一切可以掌握的材料统统掌握起来。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还要对材料作一番整理加工的工作,一是对材料进行考订,去伪存真;二是对材料进行分析,“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揭示出其中的规律和发展变化,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仅仅停留在反映历史生活的现象真实的低级水平上;三是在材料运用上,要记历史人物的大事,记主流,“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如果记载该人事迹的著作在当时已广为流传的话,那么,其书不论,专“论其轶事”,作为补充。司马迁的史传文学理论,既是对先秦以来史传写作经验的总结,更是他自己伟大创作实践在理论上

的升华。所以他的史传文学理论,不是空洞无物的说教,而是具有极为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对后代史传文学的理论和创作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第一位传记文学作家,他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刘向、扬雄、班彪、班固、王充等人都曾发表过评论,但是对司马迁和《史记》评论的最系统全面的,还是班氏父子。班彪说:“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在补写《史记后传》的过程中,他还对司马迁和《史记》作了这样的评论: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蔽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①

班彪的这个评论,以后班固在《汉书》为司马迁作传时,基本上继承了下来,

^① 《后汉书·班彪列传》。

他在《司马迁传赞》中这样评论司马迁和《史记》：

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班固的这些话，与乃父的话大同小异，只是个别文字上的不同，基本观点是完全一样的，说明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是一致的，班固是受到了班彪的深刻影响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批评，既有充分肯定，也有一些否定，表现了一个史传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肯定方面而言，主要有三点：一是说司马迁描写人物传记的素材，主要来自《左传》《战国策》等书，涉猎很广，材料丰富，用功很勤，而且非常善于驾驭材料，贯通古今，有条有理；二是对司马迁忠于历史事实的写史精神大为赞赏，认为《史记》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之作，作为史传作品，能够获得这样的评价，是最高最好的评价；三是肯定司马迁既有史才，又有文才，能够善序事理，做到文质相称。这些评价应该说是很高很准确的。对于《史记》的不足，班氏父子尽管对《史记》的“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和体例的不统一、议论的“浅而不笃”等都有所不满和指责，但是都认为司马迁是情有可原的，他们对《史记》最大的不满是司马迁在思想上没有与圣人的思想保持一致，而是有许多地方“是非颇谬于圣人”。司马迁并非不尊孔尚经，历史上第一个尊孔子为“圣人”的正是司马